

赵永纪 著

清初诗歌

# 清 初 诗 歌

赵 永 纪 著

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

(京) 新登字101号

清 初 诗 歌

赵永纪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10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3017733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375 字数 273千字

1993年5月 第1版 1993年5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册

ISBN 7-80091-424-0/I·97

---

定价: 7.7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概论           | ( 1 )   |
| 一、清初诗坛概观         | ( 1 )   |
| 二、清初诗论概观         | ( 15 )  |
| 第二章 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   | ( 32 )  |
| 一、清初诗人对屈原、陶潜的学习  | ( 33 )  |
| 二、清初诗人对杜甫的学习     | ( 38 )  |
| 三、清初诗坛上的宗唐与宗宋    | ( 53 )  |
| 四、清初诗人对明代诗歌的批判继承 | ( 69 )  |
| 第三章 江左三大家        | ( 90 )  |
| 一、钱谦益            | ( 90 )  |
| 二、吴伟业            | ( 115 ) |
| 三、龚鼎孳            | ( 130 ) |
| 第四章 遗民诗人         | ( 142 ) |
| 一、清初遗民诗概观        | ( 142 ) |
| 二、顾炎武            | ( 160 ) |
| 三、吴嘉纪            | ( 173 ) |
| 四、钱澄之            | ( 186 ) |
| 五、杜 浚            | ( 201 ) |
| 六、阎尔梅            | ( 212 ) |
| 第五章 冯舒、冯班与虞山派    | ( 224 ) |
| 第六章 申涵光与河朔诗派     | ( 244 ) |
| 第七章 岭南三大家        | ( 259 ) |

|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屈大均    | ( 259 ) |
| 二、陈恭尹    | ( 286 ) |
| 第八章 国朝六家 | ( 298 ) |
| 一、施闰章    | ( 299 ) |
| 二、宋 琬    | ( 308 ) |
| 三、王士禛    | ( 319 ) |
| 四、朱彝尊    | ( 346 ) |
| 五、查慎行    | ( 360 ) |
| 后记       |         |
| 引用书目     |         |

# 第一章 概 论

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。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如同绵亘的山脉，虽时有高低起伏，却从未间断。发展到清初，形成突兀而起的又一峰峦，与唐、宋两座高峰并峙。本书试图对清初诗歌作一些探讨，虽入宝山，而所得有限，或有助于将来的进一步发掘。

## 一、清初诗坛概观

### (一)

清初，这里是指清廷入主中原之后的顺治、康熙两朝，约八十年（1644—1722）的一段时期。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，清初诗坛是比较繁荣、成就也比较高的一个阶段。

清初诗坛的繁荣，首先表现在作家人数众多。康熙中叶，孙铤在《皇清诗选》的“刻略”中说：“即今数十年间，名噪吟坛者，已不下千百人。”曾灿《过日集》序中更说：“今日能诗者之多，为唐、宋以来所未有。”清初这些选家的话，并非夸语。虽然经过清廷多次有组织地大规模地

查禁销毁违碍书籍，经过二三百年的淘汰，现存清初诗歌作品，数量仍很可观。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中，录有他本人收藏的以及借得的顺治、康熙两朝诗集六百余家，并说：“默念海内公私藏书中，求顺、康集部，当尚有四五百种。”（卷首《自序》）两数相加，超过千种。有诗歌专集流传下来的尚如此之多，如果就各种总集中所选录的作家而计，那数量又不知要多少倍于此了。

这众多的诗人，遍布于全国各地。在许多地方，还有诗社的组织。杨凤苞《书南山草堂遗集》中说：“明社既屋，士之憔悴失职，高蹈而能文者，相率结为诗社，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。”特别是江南一带，更是“无地无之。”而且往往一地之内，数社并存。如嘉兴就有萍社、澹鸣社、彝社、广敬社、澄社、经社等等。这些诗社，经常有活动，不少人在一起唱酬切磋。由于其中不少是明朝遗民的组织，因此被清廷视为大忌，屡屡严令禁止。顺治九年，清廷下令“刊卧碑于明伦堂之左”，其中一条就是“禁立盟结社”。（王先谦《东华录》）各种诗社、文社一律禁止。康熙年间也屡次重申此令，直到雍正三年，还在“定例追查。”（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八）可见诗社组织是屡禁不止。诗人们在一起创作诗歌，研讨诗学，对诗坛的活跃，起了相当的作用。

清初有许多诗作，流传得很快、很广，而且往往一人倡，众人和。最著名者当数王士禛的《秋柳》诗。顺治十四年，二十四岁的王士禛，“在济南明湖水面亭，赋《秋柳》四章。一时和者甚众。”（《渔洋诗话》卷上）不几日传遍大江南北，“海内和者亦数百家。”（王士禛《题苏台杨柳枝词后》）邓汉仪《诗观初集》中也说：“和阮亭《秋柳》者

几千首。”其他如汪琬所作《苏台杨柳枝词》，也是“吴越和者数百人。”田雯《古欢堂杂著》中曾记：己未（康熙十八年）七月”，他搬家至新居，作诗一篇题壁上，“有‘东野家具少于车’，‘墙角残立山姜花’之句。俄渔洋至，见而和之。次日遍传都下，和者百人，己巳（康熙二十八年）在黔，见一孝廉诗集内亦和一篇，诘其从来，云：‘昔自江左传诵者，不知原唱谁也。’因语其故，共嗟赏久之。十年之前，万里而外，竟有此唱和之作。”田雯只是一般有些名气的诗人，尚且如此，可见当时许多佳作流布之广，和作之众。这种情况是以前所很少出现的。唐代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自长安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，士庶、僧徒、嫖妇、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。”白诗传诵之广，在唐代是很突出的。而清初一些诗的流传的广度则更有过之，而和作者之多，更是前代无法相比的。

清初诗歌的繁荣，还表现在当时诗歌选本繁多，许多人都有“当代诗选”。如钱谦益选《吾炙集》，王士禛选《感旧集》，陈维崧选《篋衍集》，施闰章选《藏山集》等等，都是著名诗人编选的同时诸人的诗选。其他如邓汉仪《诗观》、曾灿《过日集》、孙铤《皇清诗选》。陆次云《诗平》等等，都选录了有清以来的诗歌佳作，当然各人的评选标准不尽相同。王隼的《岭南三大家诗选》、吴伟业《娄东十子诗选》。宋荦《江左十五子诗选》等等，又是集某一地诗人作品的选本。可见清初的诗歌选本，也是五花八门，层出不穷。这既是诗歌繁荣的一种表现，对促进诗歌的创作与普及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清初诗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繁荣的景象呢？这是由许多

因素决定的，首先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。

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，冲击了人们的正常生活，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。毛奇龄《王鸿胪客中杂咏序》中说：

“今之为诗者，大率兵兴之后，掣去制举，无所挟施，而后乃寄之于诗。”蕉余道者《南车草序》中说：“自变故以来，诗书之气，无所附丽，天下之才人，往往化为诗人。”这是说在战乱中，科举考试不能正常进行，许多人不得不丢弃八股文而致力于诗歌。入清之后，有的地方虽然很快就恢复了科举考试，但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由于对清廷采取敌视态度，拒绝参加清廷的考试，因而很多人可以致力钻研诗歌创作。八股文取士制度，严重地束缚着一般读书人。明代和清初不少人都指出，制举是造成诗歌衰落的重要原因。吕留良《古处斋集争》中说：“窃尝谓三百年来诗文无作者，或曰是有故乎？曰：有，病坐制举业。”傅维麟《明书·文学传论》中也指出：“自制科兴，而束九牧才人之心力，以从事四子、五经经文……故艺苑寂寥，不能軋汉、魏而接唐、宋大家者，三百年才人之精神向慕，不在乎此也。”这些都尖锐地揭露了八股文对诗歌创作所造成的危害。明清之际的沧桑变革，使不少人从八股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这是形成清初诗坛创作比较繁荣，成就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清廷入主中原之后，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人很多，远远超过了宋末元初。尤侗《金孝章诗序》中指出：“鼎革之际，竞言高尚，久而饥寒驱迫，改柯易叶者比比。”可见在清初一段时期内，不臣服于清廷、不参加清廷科举考试的人，数量众多。由于清廷不断地施展威胁与利诱的种种手段，不少人才改弦易辙。但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的遗民，仍然有相当大的数量，其中很多人都是致力于诗歌创作的。遗民诗人是

清初诗坛上一批重要的作家。其他科举不得意而“复为诗歌，以摅其不甘之心”（毛奇龄《凌生诗序》）的人，就更多了。

一方面是抛弃制举而致力于诗，另一方面，清廷为了笼络人心，巩固统治，多次搜罗在野之贤，征召山林隐逸。其中有些是因负诗名而被荐举者。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辞特科，试题就是一诗一赋。康熙皇帝多次出巡，都有一些人因献诗而得官。作诗成了一条终南捷径。这对刺激诗歌创作的活跃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另外，顺、康两朝的文字狱，还没有雍正、乾隆时那么严苛。影响重大的“《明史》案”与“《南山集》案”，都是因作南明史而得罪。虽有因诗而致祸者，也只是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的。这期间清廷钳制思想的种种措施，对诗歌创作的消极影响不可忽视，但还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。

与最高统治者提倡文教相适应的，是清廷官僚中不少人都以诗著名。王士禛就以“博学善诗文”，“赋诗称旨，改翰林院侍讲，迁侍读，入直南书房。”象他这样“自部曹改词臣”，（《清史稿·王士禛传》）时论以为荣。当时有些官僚喜招徕文士。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记载：“康熙初，士人挟诗文游京师，必谒龚端毅（鼎孳）公，次谒长洲汪苕文（琬）、颍川刘公馥（体仁）及予三人。”这几位官僚诗人尤喜奖掖后进，如果诗文受到赞赏，就会得到很好的接待。有些地方官也对诗人另眼看待。王士禛记载，当他去拜访老诗人邵潜之后，“县令闻之，立除其役。”（《渔洋诗话》）当诗人王誉昌因事下狱时，有人质问巡抚、曾选编《江左十五子诗选》的宋荦说：王“何渠不若江左十五子也？”“宋荦闻之，大惭，立解其狱。”（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

七) 这些当然不能说在清初是普遍现象，但也说明在不少地方诗人还是比较受优待的。

清初诗歌的繁荣，也是由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所决定的。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，人们的生活在急剧地变化着，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比太平时代更丰富多变、更强烈真挚，许多人就运用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。邓汉仪《诗观初集序》中说：“夫惟变之极，故其人之心力与才智，亦百出而未有穷，其历乎兴革、理乱、安危、顺逆之交，中有所藏，类不能默然而已，以故忧生、悯俗、感遇、颂德之篇，杂然而作，一时公卿以迄韦布，其号为能诗，沉雄古丽，安雅柔澹，以几于汉魏四唐之盛者，盖指不胜数。”诗歌这种形式，经过长期的发展，到清初时，已为一般人所掌握。它最为简捷灵变，最适合于表达丰富的感情，记述多变的境遇，这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替代的。比如清初人们的亡国之痛、故国之思，就大量地表现在诗歌中，戏剧、小说中也有表现，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、董说的《西游补》等，数量则很少。这是因为戏剧、小说这类作品，当时还未能广受重视，也因其形式所限，非一般人所易为。就是传统的古文，也不如诗歌轻灵便当。李邕嗣《钱退山诗集序》中说：“余尝见近世士大夫所传集，率诗多文少；诸山人游客所贻行卷，惟以诗。”就是说明这种情况的，所以唐宋之后，虽然词、曲、戏剧、小说等新的文学样式不断涌现，终不能取代传统诗文的地位。王国维所谓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（《宋元戏曲考序》）只是说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，即每一时代都有一类文学样式成就最高，并不是以之代替、抹煞其他文学形式。

当然，评价一个时代某种文学形式的成就，不能只看作

家、作品的数量，而且主要的不是看数量，如果只是剽窃模拟前人，粗制滥造，那就是“虽多亦奚以为？”清初诗坛作家作品繁多，自然不免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精粗杂陈，真赝并出，但是水平高的作品，成就大的作家，也不在少数。正是这些比较优秀的作家、作品，促成了清初诗坛的繁荣，代表了清初诗歌的成就和地位。

## (二)

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，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。”（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这是十分正确的。但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映，其程度有深有浅，有广有狭，有比较全面与比较片面等等的差别，而这正是评价作家、作品和一个时代文艺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。综观清初诗歌，可以看到，它是比较全面、比较深刻、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。

清初成千上万的诗人中，各人的出身、经历、境遇等各不相同。汪琬《张青瑀诗序》中说：“昔贤论文，有二体：有台阁之体，有山林之体，惟诗亦然。”这是说在封建时代，除了民间作品之处，诗人大致上可分为官僚与布衣两大类。而在清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就复杂得多了。即以官僚而论，有由明入清的两朝元老，有入清后才步入宦途的新贵；以布衣论，有坚持气节至死不渝的遗民，有科举不得意的士子。这只是大体区别，各人又有具体情况。如被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的著名诗人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孳，都是明臣仕清的；钱是主动迎降，吴是被迫应征，二人都很快就脱离了清廷，钱还与南明抗清力量有联系，而龚则一直在清廷做官达三十年之久。明末清初的动乱，使清初诗人的生活

经历呈现了十分复杂的面貌，也正因为此，他们才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比较广泛，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。

清初许多诗人亲身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沧桑变革，对亡明的思念是清初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。那些以明遗民终身的人自不必说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表现亡国之痛的篇章；即使那些降清后做了高官的所谓“贰臣”，不少人也有悔愧交加的诗歌。龚鼎孳降清后位至礼部尚书，但他《与吴梅村书》中说：“且身既败矣，焉用文之？顾万事瓦裂，空含一线，犹冀后世原心，宜郁遣愁，亦惟斯道。”一方面悔恨自己大节有亏，一方面在满人的挟持下做官，也并不那么畅心，所以他们的诗歌中也每每流露出对亡明的思念。章炳麟曾说：

“合肥龚鼎孳、太仓吴伟业，皆以降臣善歌诗，时见愤激。”即是指此而言。

就是那些明亡时年龄尚小，甚至在清朝才出生的人，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表现了兴亡之感。王士禛的《秋柳》诗，其中到底有没有对亡明的怀念？这是历来有争议的，以致在乾隆时有官僚“摘摭告发”（见管世铭《追忆旧事》，事详后）几乎又兴一起文字狱。生于康熙年间，即清廷统治全国二十多年之后的屈复，在诗文中仍然“随时流露故国之思”。这是因为，清廷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，满族不仅人数远远少于汉族，文化也落后得多。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实行许多民族压迫政策。清统治者大肆宣扬“满汉一体”，一视同仁，实则民族偏见是一直存在的，只是在不同的时期，程度不同而已。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压迫的反抗也是接连不断的。诗人作品中的故国之思，就是这种反抗的曲折的反映；至于直接抨击清廷，揭露其罪行的作

品，大部分都出现在遗民诗人的笔下。揭露和反抗民族压迫，是清初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，人口锐减，田地大量荒芜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许多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萧条。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诗人，经常耳闻目睹这种惨景，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，有些人诗中对此也有反映。年仅十五岁就“以监生拟通判用”，后来又一直仕途得意的宋莘，在《登废城》中写道：“烽火照郊原，通衢走狐兔。遗骸樵夫拾，废堡山僧住。回头市井间，人烟已非故。”描写了战乱把一座繁华的城市，变成鬼火飘荡，野兽出没的颓井残垣。汉军旗人范文程之子范承谟在《行田纪怀》中写道：“疮仍无肉何由补，茧已穷丝不及忙。满地榛芜成草昧，稽天崩溃竟洪荒。老翁行役悲沟瘠，寡妇诛求哭路旁。闻道使君生化虎，更传令吏共为狼。”描写了在荆棘遍地的荒凉之中，幸存的百姓在清廷大小官吏这些虎狼的残害压榨下，奄奄待毙，他们二人都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，从小就踏入仕途，一直春风得意，与社会底层接触不多。但即使如此，那严酷的现实也在刺激着他们，使他们不能无动于衷，而要表现在诗篇中。至于诗人中那些地方官，那些贫困潦倒的布衣之士，特别是那些遗民，他们对于清廷在征服过程中的烧杀掳掠，在统治稳定下来之后的横征暴敛，对于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劫难，在统治者压榨下的痛苦生活，描写得更为广泛，反映得更为深刻。清初战乱中，“中原尽为荆棘，黎庶悉遭屠戮”，（《诗观初集》卷首）是清初诗歌中又一突出的主题。

清廷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，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、发展生产的措施，特别是康熙中叶之后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

停止，康熙皇帝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，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，社会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，成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所谓“盛世”。这些在清初诗歌中也有反映。但即使这段时期，仍有不少地方，百姓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，深受各级官吏的掠夺与迫害。“书史但称是时之盛，民生疾苦，不能尽知。唯诗人咏叹，时一流露，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观”。（《清诗纪事初编》卷首）

清初诗歌中所描写的社会现实，许多是史书所不载或不详的。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历史事实，是清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、予以歪曲的，所谓“实录”的多次修改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而清初诗人，许多正是为了“以诗补史之阙”，（黄宗羲《万履安先生诗序》）以诗“正史之讹”（杜浚《程子穆倩放歌序》）就是要揭露清廷所掩盖，所伪造的历史真面目。魏禧《纪事诗抄序》中指出，诗人“于当世治乱成败得失之故，风俗贞淫奢俭之源流，史所不及纪、与忌讳而不敢纪者，往往见之于诗。或直述其事，不加褒贬；或微词寓意以相惩，盖不一而足。”清初许多诗人正是这样自觉地用诗歌来表现“史所不及纪与忌讳所不敢纪”的社会生活，因而给后人研究、认识这一段历史真相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。如顺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销案，是清廷对南方反清情绪的一次大镇压，“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属官绅士子，革除至万数千人，并多刑责逮捕之事。案亦巨关，而《东华录》绝不记载”，“不见于官书，私家纪载亦不敢干犯时忌，致涉怨谤”。孟森所著《奏销案》一文，对此案进行了详细考证，所引多当时人诗文中的记述之语。象这样例子绝不只是个别的。

清初诗歌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广阔的，上至皇宫

贵族的荒淫无耻，朝廷内部的党派斗争，下至一般百姓的生活，风俗民情，以及山川景物，无不出现在诗人的笔下。特别是那些反映了清初社会中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作品，更值得重视。清初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，完全可以和唐诗、宋诗相媲美，也不亚于同时代的戏剧、小说等文学形式，就其直接性与广泛性上说，甚至超过它们。

至于以诗歌描述个人经历，抒发自己的情怀，更是诗歌这一形式的特长。施闰章《毛大可诗序》中说：“今四海干戈未宁，独风诗为盛，贫士失职之赋，骚人怨愤之章，宜其霞蔚云属也。”就是说这类感慨个人遭际，发泄胸中不平的作品非常丰富多采。尤侗《唐魏子诗序》中说：“盖唐子自述其诗有五：为乱离，为流寓，为归田，为游览，为应酬。”可见即使是描写个人生活的诗篇，其内容也比承平时代要充实得多。因为社会的动荡，必然要影响到诗人的生活与作品。

### （三）

清初诗歌在艺术上也比前代有所发展，出现了不少影响较大，成就较高的诗人。

清初的叙事诗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就是抒情与叙事两种类型，不过以抒情为主的诗总是占绝大多数，而象《孔雀东南飞》和杜甫《北征》那样的长篇叙事诗，寥寥可数。但在清初诗坛，这种类型的作品大量涌现，仅吴伟业“梅村体”的长篇叙事诗，就有十数篇之多。其他如钱澄之《髯绝篇听司空耿伯良叙述诗以记之》、屈大均《维帝篇》、龚鼎孳《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韵》、杜浚《初闻灯船鼓吹歌》、朱彝尊《风怀二百韵》、吴兆骞《白头宫女

行》等等，都是洋洋大篇，或记个人之事，或写时代之变，都从不同的角度，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社会生活，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。至于短篇的记事诗，那就更是举不胜举。这与清初诗人重视“诗史”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清初诗人在继承前代遗产方面，花了很大功夫。明末诗坛上七子、竟陵诸派的论争，在清初仍然继续着，但不少人都能跳出派别的小圈子，比较全面地看问题了。他们认识到明季诸派，各有长处，也各有弊端，庞垍《诗义固说》中指出：“有明代起，王、李争于气格，其失也肤阔；钟、谭矫以幽澹，其失也浅弱。”贺贻孙《诗筏》中说：“舍性灵而趋声响，学王、李之过也，舍气格而事口角者，学袁、徐之过也；舍章法而求字句者，学钟、谭之过也。”指出了明季诸派的缺点及其追随着的流弊。林时对《杲堂诗抄序》中说：

“正、嘉以逮隆、万，琅琊树高华之帜，公安振清英之响，竟陵标澹远之宗。”又是肯定了他们各自的长处。正是在认识到明季各派“各有得失”的基础上，他们努力继承其长处，而避免其弊端。魏礼《答沈仲孚胡若木欧上闲书》中说：“傥取竟陵之务挾性灵以益历下，历下之声光斗美以益竟陵，未尝不兼得也。”这种观点代表了清初不少人的认识。

宗唐诗还是宗宋诗，在清初诗坛上也引起了较长时间的争论，在清代之初，宗唐派是主流。钱谦益等人倡导宋元诗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但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。到了康熙初年，宋诗派开始兴盛，许多宋、元人的诗集，大量刊行，宗宋派占了上风。但是仅学唐诗或宋诗均有流弊，必须兼宗唐宋，广泛师承。曾灿《过日集》凡例中说：“唐诗尚风华，故多浮而不实；宋诗贵尖刻，未免显而近粗。余所选者，虽不敢云藻鉴之至精，然准之古人之诗，唐宋两病，吾